

■本期主持:邢来顺(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近代西方国家的乡村建设

主

近代以来,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经营传统农业的乡村地区日渐衰落甚至陷入危机的过程。乡村地区如何摆脱发展窘境,实现现代性跟进,保持生机与活力,也就成了各国必须直面并着力解决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由于国情各异,各国在探索乡村的现代性调适和治理方面所形成的模式也不尽一致。为此,我们以德国和英国为考察对象,介绍它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和改造方面的历史经验。

# 德国乡村重振运动的历史考察

□ 邢来顺

在当今高度城市化的德国,有3.5万个村庄点缀于美丽的乡野。它们与喧嚣繁华的现代都市和谐共处,宁静清幽却充满生机。德国乡村的这种活力与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乡村重振传统不无关系。

## 德国乡村重振运动的历史回顾

乡村重振运动在德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德国人通常把16世纪中期始于施瓦本普滕侯爵领地的“土地重划”运动视为乡村重振运动的发端。当时乡村发展面临着生产和居住两大困境:随着新开垦土地增多和三圃制的推行,许多农民的耕地被分割散落各处,严重影响耕作效率;传统的封闭型集中定居模式容易引发大规模火灾。“土地重划”就是要对耕地进行整合清理,使各户农民耕种田地连片,农民就近安家,从而提高耕种效率,用单个农户定居取代了封闭式集中定居点。这一合理化进程在开明专制时期进一步强化,一定时期内使乡村摆脱了发展困境。

19世纪上半期,德国新旧势力博弈激烈,政治局势剧烈动荡。逃避现实、遁入田园的浪漫主义情结大行其道,美丽古朴的乡村成为人们的向往之地。巴伐利亚王国建筑总管古斯塔夫·A·福尔赫尔趁势在德国发起了“乡村美化运动”,提出改善耕种环境,建设和维护乡村景观及特色建筑,重振乡村生活。福



乡村重振计划实施后的图林根沙伦堡村街景

# 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乡村改造

□ 孙立田

就英国而言,工业化进程对乡村的影响不能完全以“挑战—应战”或“冲击—回应”模式解释,因为以乡村工业为标志的工业化第一阶段首先是乡村起步的,工业化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特有的共生与互动关系,因此英国乡村从一开始走的便是一条具有代表性的内发变迁类型。不过,随着工业化第二阶段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实现,农业的持续衰落,英国乡村开始了新的调整与改造,探索出了新的发展之路。

从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英国乡村地区普遍出现了家庭工业,经历了乡村工业化,即原工业化,是一种早于或先于工业革命阶段的工业形态。英国乡村由此出现第一次转型。

英国乡村工业化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城市要素向乡村转移,同时借助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丰富的原料来源、有利的自然动力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当时英国各地都有乡村工业,包括毛纺织、棉麻纺织、服装、酿酒、粮食加工、皮革加工制作、玻璃、造纸、建材、制陶、冶炼、金属制造、采煤、制盐等。

乡村工业化进程首先促进了乡村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在乡村工业地区,“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随着乡村工业化的开展,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1520年乡村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6%,到1600年约占70%,1700年占55%,1750年占46%。乡村工业同时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在乡村工业发达的地区,兴

起了一批介于村庄和城市之间的工业集镇,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到18世纪初,这样的乡村集市和小城镇在英格兰有700个左右。与大城市不同,小城镇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乡村工业的发展保持着协调一致的关系,承担着向外输出本地农业、工业产品,同时为本地乡村提供多种服务功能。就整个英格兰而言,乡村小城镇的地理布局颇为合理,农民到小城镇赶集的平均距离只有7英里,可在一天内轻松往返。

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英国乡村呈现出新的面貌。乡村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传统的农业生产更趋专业化和商品化,工业及其协同发展的城镇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些都为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是英国工业化第二阶段,即工业革命阶段。英国在该阶段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与之相伴的是传统乡村的不断缩减与衰落。工业化的深入,直接推动英国在19世纪中叶实现了城市化。18世纪早期英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25%,1801年占33%,而到1851年时已占总人口的50.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到1881年,英国城市人口是乡村人口的两倍。工业化的深入也使农业开始了由盛而衰的漫长过程。截止到19世纪中期,英国农业一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750年耕种面积950万英亩,1815年达到1200万英亩,1850年总耕地面积达到最高峰的1350万英亩。劳动生产率保持增长。1750年时一

项农产品的产量可以养活2.19人,1800年为2.5人,到1860年为6人。1851年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从事农业的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超过20%,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也超过20%。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农业走向难以遏制的衰退阶段。1875—1884年,1891—1899年间,爆发了两次农业大萧条,加快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城镇的转移。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以后,国外农业失去了保护屏障,来自国外的粮食与食品竞争的后果开始显现。在伦敦,4磅面包的价格从1867年农业歉收时的10便士降到1901年时的5便士。到19世纪末,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还不到10%,而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则下降至6.7%。很多人认为,农村人口将会继续大量减少,农业有崩溃的危险。

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逆转的趋势,英国乡村此时面临着再次调整与改造的问题。

一是调整农业结构,重点发展畜牧业。基于自然条件,英国农业自古以来就有农牧混合经营的特点,加之农业劳动力严重下降的现实,发展畜牧业开始成为重点。此时,在全部农业用地中,永久性草地和临时性草地超过了农业用地的一半,为53%。事实上,农业结构的调整在工业革命发生前后已经开始。从18世纪50年代起,粮食种植业产出的市场价格份额占比一路下降:18世纪50年代占57.8%,19世纪初占48.5%,19世纪60年代占40%。畜牧业产出的市场价格份额

占比相应攀升:18世纪50年代占42.2%,19世纪初占51.5%,19世纪60年代占60%。

二是发展兼具提高农业商品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替代农业。替代农业即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传统农业以外的种植农业,包括为日常生活所需的水果、蔬菜,为园艺服务的园艺农业,为工业生产的原料等。1906年,埃德温·普拉特在其《农业的转型》一书中评论说,家庭农场主明显转向“替代农业”,制定了新的耕种目标,奶牛业、园艺业、家禽业开始稳步发展。

三是近代郊区的出现。从19世纪下半叶起,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并向郊区迁移。“郊区是中产阶级文化价值观所创造的完美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以富有商人、店主和企业家群体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有人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中产阶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私人住宅应当远离闹市街道的喧嚣嘈杂和脏乱忙碌。这部分人能够负担得起每天乘车往返于城市工作地与郊区居住地之间的费用,是最有意愿选择居住在郊区的人。受此影响,郊区这种在世界大多数城市占特殊地位的地理结构形成了。

四是开展乡村保护运动。正是在乡村逐渐走向“消失”之时,人们开始思考乡村的存在意义,“乡土”这个古老的文学体裁成为19世纪人们最热衷表现的对象之一。19世纪英国首次有人提出建立国家公园的建议。“全国托管协会”(1895)、

单一项目促进形式,被精心规划设计为整体性联动工程。原先单一性促进乡村发展的项目被纳入乡村总体规划中,包括土地规划在内都必须捆绑施行。

其二,联邦政府提出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乡村生活品质 and 增强乡村吸引力的总目标,各州则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各自乡村重振规划。例如,下萨克森州提出确保地方特色建筑物利用,改善居住环境,维护乡村景观和生态多样性,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黑森州则立足于“发展”,提出把乡村建成魅力十足的生活空间,拓展乡村文化和经济潜力,保持乡村生活多样性,彰显黑森乡村个性特点等。

其三,乡村重振规划有明确的执行“路线图”。乡村重振的具体规划由乡镇一级提出,当地居民和地方所有者共同参与实施。以下萨克森州的卡尔滕堡—林道镇为例,其乡村重振规划为村庄建设树立了典型:保持村庄特色;改善村庄环境;保护乡村绿色生态;发展农业经济。具体落实则采取“项目资助”形式,直接而富有成效。例如,该镇基勒海姆村1984—1989年共投入100万马克用于村庄建设,除了公共设施外,还有40%的私人设施受到资助。受资助项目集中于改善地方交通,整治水利设施,维护和开发乡村特色建筑等。

其四,欧盟、联邦和各州给予充裕资金支持。在欧盟层面,“欧洲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农业基金”、欧洲农村发展“引领项目”等都是重要资金来源。后者仅2000—2006年就投入2.5亿欧元支持德国乡村重振项目。联邦层面,则在1969年通过“改善农业结构和海岸保护”共同任务法,规定通过补贴、贷款、担保等方式支持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保护乡村景观和自然环境,建设基础设施等。联邦农业税占国家总税收的2%,农业投入却占国家预算的7%,投入力度可见一斑。各州投入资金力度也非常大,巴伐利亚州仅1982—1986年用于乡村重振的资

金就高达3.3亿马克。最后,乡村重振通过竞赛成为一种全国性运动。为了推动全社会关注乡村重振,联邦德国从1961年开始举办三年一次的全国性“我们村庄更美丽”竞赛。参赛村庄要着力于绿色设施和鲜花的美化,以增强吸引力。竞赛分为县、区、州和联邦四级平台。首先是村庄报名登记并做汇报,然后是评选委员会考察参评村庄,评定金银铜牌村庄;获得金牌者升入更高级平台竞争。最后极少数村庄进入由联邦食品和农业部负责的全国评比,获胜者冠名为“我们村庄明天会更好”,竞赛取向从表象性“美丽村庄”向内涵性“乡村生活品质”转变。除了鲜花和绿草,村庄的经济、文化和传统受到更多关注。竞赛理念从只关注生态环境的“浅绿”向强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友好”的“深绿”转变。

新的乡村重振效果明显,乡村变成了德国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德国生产的土豆、牛奶、肉类等主要食品自足有余,粮食安全得到确保;农户收入也大幅增长,仅政府各种补贴就占到农民收入的一半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乡村功能得到优化。乡村不只是粮食生产者,还是自然景观和传统人文景观的维护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地,人们舒适生活和休闲旅游的去处。乡村的如画风景和古朴宁静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呈现出勃勃生机。(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自然保护区保护协会”(1912)、“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1926)等组织先后成立。在乡村保护运动中,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贡献卓著。该组织承认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强调乡村的传统风貌应予保护,城市的无限扩张必须得到遏制,它促成了很多涉及乡村保护法令的颁布。193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城乡规划法》,首次提出要遏制城市向乡村扩张,确保乡村农业和林业用地不受发展规划影响,同时对乡村地区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进行保护。

在今天,英国乡村被赋予了太多的期望与价值。它不仅为人们保留了历史的记忆,使人们徜徉于历史的长河中回味民族与国家的过去,承载着国民教育与历史教育的功能,而且在精神上使人们有了一种归属感,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创造的活力。对于每个公民来说,乡村是寻找自身根源的直接土壤;对于国家而言,乡村是保持自身民族特性的重要载体。当然,利用乡村历史资源与自然风景,发展旅游业也是发展方向之一。所以,英国乡村的改造与发展并非表现在如何恢复农业人口增长,如何再现乡村历史上的辉煌,而是表现为既能享受城市一样的现代生活和文明成果,又能享受自然美景,表现在对乡村地区历史资源与自然风景的保护及其开发利用方面。如今英国乡村就业人员中,农业占6%,制造业占25%,旅游业占9%,零售业占7%。

随着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向乡村的延伸,乡村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完善,英国乡村独有的生活风味也显示出吸引力。20世纪晚期以来,英国出现了城市人口向乡村迁移的新现象。1991—2002年期间,英国每年有6万人净迁移到乡村或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上巴伐利亚恩格尔布萊希特明斯特村的乡村重振纪念碑

梅雪芹

在英国,乔治·麦考莱·屈威廉(1876—1962)不仅是家喻户晓的史学家,而且是颇负盛名的乡村和自然保护者。作为史学家,他所撰述的许多历史著作成为畅销书,获得了极大的社会效益;作为保护者,他积极参与乡村和自然保护活动,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1912年,他致信《泰晤士报》,支持“全民参与历史名胜或自然美景保护组织”(以下简称“全民参与组织”)的募捐活动,以获取一处古罗马城堡。1913年,他再次致信《泰晤士报》,抗议在湖区斯加菲尔峰之上修建机动车道。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继续致力于乡村保护,不仅在历史作品中表达对英格兰乡村的热爱之情,而且积极参与“全民参与组织”的保护事业。1925年,他通过多方努力,帮助该组织获得了包括两块公地和一片丘陵,面积达1600英亩的阿什里奇地产。因为此举,加之其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自然的热爱之情以及在公众中的崇高声誉,屈威廉于1926年当选为“全民参与组织”理事会成员,并出任该组织的地产委员会主席和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从而更加主动地投身于保护英格兰乡村及其自然美景的事业。

屈威廉生活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30年是英国城市化水平提升和大战后恢复发展时期,“砖瓦进军”的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地区被开发建设成为城市、工厂、道路等,随之大量的乡野空地和自然美景或消失或面临消失的结局。于是,在1929年,屈威廉代表“全民参与组织”发表一份抗辩书,题为《一定要破坏英格兰的美景吗?》。其中,他特别基于该组织的保护工作阐述了一个大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拯救英格兰?”在他看来,拯救英格兰就意味着保护它的自然美景,而英格兰的自然美景是值得劳心费力地加以保护的。

首先,他从经济方面阐述了最浅显的保护理由,“自然美景是有价值的资产”。他说道:“现如今,自然美景是有价值的。游客到访英格兰……前来领略这块绿岛的花园散迷人景色……如果我们损失了我们这块岛屿,也就削弱了他们的后代到访的吸引力。并且,对整个民族来说,这块岛屿上的自然美景是一种经济资产和荣誉之源;与此相一致,对地方居民来说,每个郡和每个地区的自然美景也是财富和荣誉的一种源泉。”他认为,如果德文郡或萨里郡的人们容许本郡那些对个人来说没有直接好处的特色对象被毁,那么他们就是一群“不善经营的人”。由此他批评了英格兰一些地区的居民在其美丽无比的表面上开发建设的行为,说他们的倾向无异于杀鸡取卵。

第二,他从精神价值方面阐述了保护的理。在他看来,拯救英格兰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件不关乎金钱的事情。相反,他强调,应该为整个英格兰民族的幸福、马尔文精神健康而着手从事这项工作。自然美景已成为本民族生活和遗产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对它的保护也就是一项“深切关注每一类致力于维持理想标准和健康生活之人”的事业,而这项事业已赢得各行各业人们的普遍支持。他们懂得,“如果自然美景消失,那么,宗教、教育、民族传统、社会改革、文学和艺术等,所有这一切都将丧失一种生命和活力的重要源泉”。保护自然美景被视为一种卓有成效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因为它滋养着这个民族的以及每一个人的精神。“缺乏想象力,一个民族就会堕落;而缺乏自然美景,英格兰民族的精神或心灵就会麻木”。

第三,他从国民历史意识培养方面阐述了保护的动机,认为基于“全民参与组织”保护历史名胜和自然美景的目标,这项保护事业“将会培养我们人民的历史意识,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祖先以及在这片岛屿上所有先民的生活;而这种历史意识并非体现为对历史著作的抽象阅读,而是深情地映照在脑海中的一种现实存在”。他已看到,公众参观游览古罗马废墟、中世纪土木工程、城堡、教堂、庄园大宅以及旧时村庄等名胜古

迹的热情正在日益增长,譬如每年参观位于萨塞克斯郡东部的博迪亚姆城堡的人数达几万人,而由于交通运输的改善,参观游览历史遗迹和建筑已成为现代教育中最具启发意义的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英格兰的城市居民可以满怀深情地理解其先辈迥异的生活,甚至可以大大改善他们的精神面貌,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当‘历史名胜’屹立于‘自然美景’之中,会强有力地产生这一效果,譬如,坐落在草地和树木之中的博迪亚姆城堡、富有浪漫色彩的林地上的查德沃斯古罗马庄园以及古老荒凉之地上的巨石阵等,即是如此”。当然,有些地方,像英格兰南部的丘陵地、埃文河河岸、有罗宾汉或猎人赫恩在那里窃窃私语的原始森林或古老猎园里的树木等,即便根本没有任何建筑物,也有可能成为“历史名胜”,也是值得保护的。因为“在自然荒野的深处,一个人最能感受到与其祖先的联系”;在那里,他们可以暂时摆脱时代的喧嚣,徜徉于先贤们身体过的那片绿野,像他们一样,与自然独处,并享受片刻的宁静。

可见,作为史学家的屈威廉在从事自然保护活动时,对于为什么要开展这项工作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在他的领导下,“全民参与组织”的保护工作更加卓有成效。由于屈威廉及其同代人的不懈努力,华兹华斯钟爱的英格兰湖区、剑桥大学周边的乡村、马尔文丘陵以及诺森伯兰郡的沿海地带等许多地区得以挽救和保留下来,使其后代以及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到此游览、欣赏。1931年,屈威廉应邀在伦敦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为自然美景鼓掌与呼》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重申了人们与自然世界联系的重要性,各历史时期英格兰的原野和森林对于滋养英格兰文学、艺术的作用,自然美景因多姿多彩而具有的审美价值,以及因年年复苏而带来的生命意识和喜悦,由此进一步明确了保护英格兰自然美景的必要性和意义,并表达了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尽力保护自然美景的决心。

在乡村和自然美景保护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宣传、教育,成为屈威廉在历史著述之外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一个史学家,基于对一国历史文化及其乡村、自然根基的深刻认识与热爱,以及对国民幸福和精神健康的关注与考量,积极开展乡村与自然保护实践并宣讲自然美景的价值,这种情思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它在拓宽我们对于历史与现实联系的一种认识的同时,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学者之工作的形式、内容及其意义的思考。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654 邮箱:gmrbsjs@163.com

